

复旦大学历史系七十五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校友会编

论文选



篤志集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篤志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七十五年
论文选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校友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策 划：施宣圆 张晓敏

责任编辑：秦志华 王 纯

笃 志 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七十五年论文选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校友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60×1156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6 字数 404,000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25-2763-8

K·305 定价：31.00 元

“历史是民族的史诗”

——代 序

历史正在向我们走来，起初它步履蹒跚，稚嫩而弱小，继则它的步伐加快了，茁壮而富有朝气，进而发现它脚下的路并不平坦，自需披荆斩棘，沿着那曲折而坎坷的蹊径前行，不过它总是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走着，走着，一步一个脚印……

这就是自 1925 年创立，走过了风风雨雨七十五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笃志集》生动地记录着历史系这七十五年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着历史系那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

这本纪念文集取名《笃志集》，出典于《论语》中的一段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训。在这里，“笃”者，忠实与执着之谓也；“志”者，志向与抱负之意也。是的，历史系七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确是属于那些矢志不渝，终身为历史学而献身的人。

《笃志集》汇集了历史系几代学者的成果，凝聚着他们的辛劳。本书所收论文，其写作年代相距七十余年，几乎与历史系同龄；全书内容包括中外，涵盖古今，或论中国史学之变异，或探域外史学之得失，兼及政治、经济、社

会与文化等重要课题,内容丰赡,论证精审,真是佳作成篇,美不胜收。人们正可藉此一睹历史系几代学者妙文之风采。通过这个侧面,人们可以走近历史,也更可以走近历史系,看到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系的形象。进而言之,我以为,《笃志集》也可以作为一个窗口,通过复旦历史系,通过复旦历史系上海校友会编印的这本文集,多少窥探到时代的风云,社会的转折,更可察觉出文化的流程。倘如是,这本文集的出版,就不只是纪念意义了。

读《笃志集》,我们可以从这些华章中悟出很多东西,我这里就高等学校教育工作的视角,说一些感受。

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纵看历史系所历经的初创时期(1925—1949)、发展时期(1949—1966)、停滞时期(1966—1976)、转型时期(1977至今),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历史系人才辈出之日,正是它的兴旺发达之时。我常听到历史系的同志说,那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系,其综合实力堪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在复旦可与中文系并称“两个超级大国”,那情景真是令人歆羡。究其因,就是那时的历史系有一支比较齐全的师资队伍,有一批在全国史学界闻名遐迩的教授,诸如周谷城、周予同、耿淡如、谭其骧等一批名家,足有十几位之多。

我国新时期以来,历史系在发展,为国家培养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与此同时,从八十年代以来,初由《中国文化史丛书》与《世界文化丛书》的“两翼齐飞”,引起学界瞩目,继而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西史学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断代研究、战后世

界史研究等方面相继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此外,由于历史系阵容的扩大,从它中间又分出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82年)、文物与博物馆学系(1989年)。历史系的这些新成就以及新单位的成长也都说明,要凝聚人心,网罗人才,励精图治,不断进取,其核心还在于要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这也是历史系的事业今后要继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要培养与形成一种优良的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是我们学校的学风,也应当是历史系的系风。读《笃志集》,你看那些前辈历史学家,他们那种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学风,令人肃然起敬,也令人称道。事实也是这样,历史系素有这样好的传统,从六十年代初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到当今实施通才的素质教育,历史系在贯彻这些教学环节中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就为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创造了条件。我接触过不少我校历史系的毕业生,他们在走向社会以后,一般都以工作认真负责和具有扎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而获得好评。这里附录的系友情况,为此可作出最好的说明。须知,一种好的风气,树立难,继承更艰难,但败坏它则易矣,真可谓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我们来说,广而言之,要提倡与发扬读书好学成风,刻苦钻研成风,教书育人成风,学术研究成风,文明向上成风,……总之要让一切新风劲吹,而杜绝一切歪风。

“历史是民族的史诗”,这是十九世纪一位法国历史

学家说的。我想《笃志集》正可以为这“民族的史诗”作注。历史是宏富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可资说明,毋需再谈。我要说的是,历史的宏富为历史教育的丰润创造了条件,也为历史教育的宗旨指明了方向。在我看来,历史教育,旨趣深远,岂可小视?作为一种素质教育的历史教育,我以为它要通过传授历史知识,达到开拓眼界的目的;进而言之,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透过现象,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这就可以使人们以高屋建瓴之势观察事物,以赤诚纯朴之心敦风化俗,以振聋发聩之情敏于思考。在这样的作品中,历史系是大有可为的,它还应当为全校乃至社会的历史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历史系的一位教授这样说:“历史教育应当成为提高一个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内容,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今天,历史不应该成为一个被人们所遗忘的角落。须知,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它最终也将被历史所遗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再过五年,就是我们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了,到那时,也是历史系建系八十大庆。从人的生理年龄来说,八十岁当是老者了。但我以为,只要历史之树常青,历史学之树也该是常青的,那么历史系将永葆青春之活力,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期盼。因为,“历史是民族的史诗”,现代化事业中的历史素质的教育,离不开大学教育,尤其是离不开大学历史系等相关学科建设的支撑。

欣逢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历史系的同志们合力编了这本文集,他们执意要我为这本书作个“序”,于是便写了上面的一些话,权当为序。

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光荣与梦想

——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之际

复旦大学历史系*

“光荣与梦想”是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美国现代史实录译本的书名,由于此书的畅销,这一书名成为许多历史论著和回忆录中常用的术语,今天,在回顾复旦大学历史系走过的七十五年曲折的历程时,这五个字仍然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历史系同人此时此刻复杂的心情。

历史系曾经是以人文科学著称于世的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25年正式成立,时称史学系。抗战期间,史学系大部随校本部迁往重庆,1938年春改为史地学系。1949年,同济大学文学院等停办并入复旦大学,由于地理教学力量较弱,其他院校大部分史地分开设系,遂议决改史地系为史学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进行院系调整,组建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翻开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档案,我们会发现在院系调整前历史系曾拥有过享誉学界的一代宗师,如周谷城、顾颉刚、周予同、姚名达、方豪、陈守实、邓广铭,蔡尚思、章巽、胡厚宣等,著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闻名遐迩的地理学家任美锬都先后担任过

* 本文由邹振环执笔。

系主任。^①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有一批杰出的学者,如谭其骧等调入我系任教,开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新局面,很多学者都回忆道:20世纪50至60年代,“东周西周”、“南耿北齐”等等,^②一大批标志性学者的云集,使复旦大学历史系无论在单项研究,还是在综合实力上,都足以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是什么造就了这一时期空前的“光荣”,什么是历史系发展的精神资源,历史系从1925年以来形成的学术特色和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一、“通才”与“专才”并举的教学体系

1982年周谷城提出了如何办好历史系的几点意见,归纳起来,基础课程是政治、外文、考古和中国与世界两门通史并举,选修课程则应该涉及专史,如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哲学史、教育制度史、国别史、地区史,还应当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并建议设立翻译学课程,总之,其建议的总方针是兼顾“通才”和“专才”的培养。^③注重基础性的研究和通才的培养和专门知识的训练,这一方针在1933年修订的课程设置大纲中已经确定,即史学系的目的在于“予读者以史学之专门知识,养成史学之通才”。^④复旦大学当年作为一所文、理、法、商兼备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为历史系“通才”、“专才”并举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背景,使史学系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即历史系学生须以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为辅系;史地学系还开设了中国文化史和西洋文化史、社会形式发

展史、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等。即使1959年在“教育革命”号召下重新制定的培养计划,仍强调了要有“较广历史科学知识”这一条。这一教学体系的策划一直影响至今,80年代以来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仍然是“通才”与“专才”教育的并举,1955至1966年把学制改为五年,设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三个“专门化”,20世纪60年代曾培养过三届历史地理专业的本科生,80年和87年又分别招生过两届;1985年开始还连年招生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本科生,90年代起还开始招生旅游专业的本科生(参见附录二)。90年代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的设置都与“通才”教育的理念密切相关。

“通才”教学体系的建立,使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在职业选择时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不少毕业分配到出版社、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学生都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面赢得了同行“有历史感”、善于“全面思考”、能“上升到理论的认识”和“后劲足”的高度评价。^⑤有许多毕业生利用自己“通才”的优势,成了其他学科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如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伍贻康教授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开创和发展中国对欧洲共同体问题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虽然工作都远离历史学专业,如在冶炼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楼辉映和传染病专家杨大崢,但他们都不忘记在历史系求学时留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史学专业领域中,“通才”的教育使不少史家成了横跨几个领域的名家,如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文物与文献学、历史人物传记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朱维铮教授在从两汉经学到清代汉学、从史学史到明清思想文化史方面都卓有建树;正是有着雄厚的古今通贯的学识,姜义华教授才能完成《章太炎思想研究》的杰作和成为《中华文化通志》的总策划;周振鹤博士不仅在政区地理和文化地理方面,而且在方言和中外语言接触、上海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顾晓鸣博士 80 年代在社会学领域自成一家,并先后主编过“中国智慧丛书”和“世界智慧丛书”,最后又以犹太文化研究回归历史学,这些都反映出“通才”教学体系所生成的学术优势。

“通才”的方针使很大一批历史系的毕业生成了党政方面的出色的管理人员,如曾出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的王邦佐教授,华东政法学院的党委书记陆庆壬,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王鹤鸣研究员,上海闸北区区长郭天成,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董事长吴运筹等,都以广博的学识在领导岗位上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通才”的背景下形成的“专才”,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在史学界同样显示了独特的影响,在专门领域中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专家,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裘锡圭,他在古文字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国内外所瞩目;陕西师范大学的黄永年教授,他兼通文史,在版本学和碑刻学方面赢得了海内外的声誉;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王春瑜研究员,在明清史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其他,如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葛剑雄在中

国移民史、张广智在西方史学史、施丁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陈绛在洋务运动史、沈寂在陈独秀研究、沈福伟在中非交往史、蒋其祥在钱币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就。^⑥

“通才”和“专才”并举的教学体系的传承,是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

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与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历史系迎新生的黑板上还常常会写上:“欢迎您,未来的周谷城!”

1942年春,已经出版了80万字《中国通史》的周谷城被时任历史系主任的陈望道聘为历史系教授,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出任迁回上海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讲“世界通史”,曾用“历史完形论”来阐释中国历史的这位大师,又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阐释世界历史的模式,完成了三卷本的《世界通史》,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他成了当时青年学子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又写出一部世界通史,而且都是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直到现在依然如此。”^⑦令人惊奇的还在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周谷城不仅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中成一家之言,而且在形式逻辑方面独树一帜;相继发表了20多篇论文,1960年结集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书。1961年他

又探讨史学与美学的关系，写下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和独到见解的论文，引起当时美学界的巨大反响。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偶然，周谷城常讲的顺口溜就是“学问要如金字塔”。“博”与“精”和“通”与“专”一样，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博大”的提出是使学者不致钻牛角尖，“精深”的要求是为了避免做学问的泛滥和无所归宿。“博大精深”是一种治学方法，也是一种境界，它使学者摆脱平庸的追求，有一种很高的“眼界”。

如果说“博大精深”在很多校系只是一种治学方法的话，那么，它在历史系可以说是已经沉淀为一种学术特色和传统。经常为后人所道及的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早期以从事教育学研究知名，他当过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的编辑、教育杂志社的主编，30年代完成的代表作是《中国学校制度》和《中国现代教育史》，正是因为有着跨学科的渊博学养，才能使他在后来的经学史和史学史的研究中游刃有余。^⑧学识渊博的陈守实是全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但他还研究过中国哲学史、史学史、文献学、佛学、逻辑学、元蒙史学、边疆地理。历年来还开设过马列主义基础、中国农民战争史等课程。^⑨历史地理学大师谭其骧也有着相当渊博的学识，早年他不仅上过几门中国断代史，也上过史学史、文化史、专题研究课程，甚至连地理学、社会学的课也教过。^⑩这种知识面之“博大”在今天实在难以想像。“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还体现在许多历史系著名教授不平凡的研究思路上，如在战国史研究上自成一家的杨宽教授，同时还写出了好评如潮的《中国古代冶铁技

术史》和《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陈仁炳不仅在美国史和民主制度史的研究上有其独到的看法,而且在人口学、人类生态学、都市社会学方面,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术传统,几乎从40年代至今,进入历史系的学生总会在第一堂课上听到老师讲述“博大精深”的治学方法和“通才”与“专才”并举的培养目标。

周谷城的“学贯中西”和周予同、杨宽的“融会古今”,谭其骧、陈守实的由“博”返“约”的大师境界自然很难企及,但周谷城身体力行的“博大精深”的谆谆教诲,却一直是历史系同人奉行的研究准则,他们总会在研究中学习用“全球的眼光来看中国,和以中国与各个国家和文化的平等态势来看世界”,^①历史系的同人总是或多或少地会在讲课与研究中体现这一学术传统,历史系最优秀的课程之一——金重远的“战后世界史”和“法国史”,都充分地体现出“博”与“精”结合的这一特色。强调要以世界史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史,同时,在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不忘记以中国史作为参照系,用其丰富的内容来充实世界史还表现在中外历史与文化交流与比较的研究中,从方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章巽的古代海上交通、田汝康的东南亚和华侨问题、汪熙的中美关系史、张荫桐的东南亚与南亚研究,一直到今天复旦大学历史系同人的教学和研究,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特色。

在日益专门化的社会和浅薄浮躁的文化环境中,“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使我们能保持一种“眼高手高”的学术追求。

三、“兼容各家”的合作精神

长期以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一批具有独立个性和不随波逐流的学者的荟萃之地,“才华横溢”常常难免“心高气傲”、“舍我其谁”。1952年的院系调整,又有一批知名教授进入历史系,带来了各家的学风,如何处理好领导者和教学、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理顺颇具个性的学者和学者之间的关系,是能否办好历史系的关键问题。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谭其骧、杨宽教授,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当年的学风和个性并不相同,但都曾是“禹贡学会”很好的合作伙伴。周谷城治史重宏观研究,但作为系主任他对搞断代史和专门研究的学者表示出相当的尊重。在学术见解上不依违调和,但对于那些同样为学术努力而见解不同的学者表示充分的尊重,又是当年历史系主任周予同奉行的一个原则,^⑩多年来这也是历史系同人共同遵守的一种规范,自然也是历史系许多颇具个性的学者能够共同合作的基础。这也是复旦大学最初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⑪的民主精神的具体表现。在过去的岁月中,历史系在汪伪政权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近代人物张謇、盛宣怀的资料选编方面都有过出色的合作;这种较大规模合作的优秀成果还体现在以往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史丛书》、《沙俄侵华史》、《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和至今仍在出版的庄锡昌主编的《韩国研

究论丛》的编纂过程中。在历史系历史上值得特别提出的这种合作精神的最出色的成果是《中国历史地图集》。

1957年担任历史系主任的谭其骧教授同时又主持了国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1960年为推动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史系建立了历史地理专业。期间虽经“文革”初期动乱而使编图工作一度停顿,但70年代初很快恢复工作,并在1974年出版了内部版的大、小两种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这套图集是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全图集八册有20个图组,共304幅图,先后参与编图工作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员逾百,其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主要的参与单位,历史系的许多教师停止了自己原来的计划,投入了这项工作,其中就有历史系教授章巽、吴应寿和后来也成为历史系教授的邹逸麟和王文楚。1958年还有10名历史系的高年级学生参加了这项工作。^⑭

在这样一个有十几个单位、上百个研究人员参加的项目中,如果没有一种“兼容各家”的合作精神实在是很难想像的,正是由于谭其骧教授的合作精神,使这项建国以来历史地理学科最大的项目得以最终完成,“文革”期间,历史地理研究室被指责为“招降纳叛”,^⑮正好反证出主持人谭其骧的“兼容各家”的特色。1981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开始修订的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专业也经国家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和高教部核准,成为国家首批公布的博士点之一,蜚声当今史坛的文科第一批两名博士的周振鹤和葛剑雄教授当年就是考入历